

评 张 謇 与 梅 兰 芳 ● 叶 兵

应当感谢张绪武、梅绍武二位先生。他们联袂主编的《张謇与梅兰芳》向人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。这些史料，记录了20世纪初一位中国名闻遐迩的爱国实业家，同一位中国最具盛名的京剧艺术家之间的忘年之交。这段史实，这段佳话，足以填补20世纪初京剧艺术发展史上一块空白。

与史料相得益彰的是几位专家的客观介绍和精湛评述。这些评价，足以帮助如今的读者正确理解：企业家何以与艺术家交朋友？应当怎样交朋友？

与历史上的达官贵人、名商巨贾迥然不同，张謇爱好戏曲，同京昆艺人交友，不是为了装点门面、附庸风雅，也不是为了个人消遣解闷，更不是为了捧名角以谋私，而是为了藉戏剧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，影响改造社会，“除恶俗，立新风”，“建设一新世界雏型”。志存高远，相交以诚，这是张謇与梅兰芳之间深厚情谊的基础。

清末民初，社会满目疮痍。文人志士，忧国忧民。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做法不同的是，张謇更注重坚韧不拔地实干。1894年，张謇中状元之后，适逢甲午战败。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深深刺痛了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。他愤而辞去京城的高官厚禄，回到家乡南通，实践他“兴实业，办教育，推进地方自治”的救国主张。从此，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，踏上了“实业救国，教育救国”之路。他以“父教育，母实业”的精辟概括，道出了教育与实业之间的辩证关系，并且在实践中坚持了这一理论。他几乎倾其所有的实业收益，兴办了一系列教育事业与社会公益事业。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，兴实业、办教育的社会实践，使他痛切地感到人才之可贵、人才之难得。“立国由于人才，人才出自立学。”在当时，举凡他能延聘的人才，不论国内外，他都要千方

百计请到南通，礼遇有加，让他们施展才学。梅兰芳，就是张謇结识相交的众多人才中的一位。所不同者，他们在初识时，一个是高龄62岁的事业有成者，一个是年方21岁的初露头角的小青年。年龄的差距，名望的悬殊，终究敌不过事业上的共同追求。忘年之交，他们何止是忘了年？

对于戏曲社会功用的独到见解，也是张謇结识、帮助梅兰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张謇认为，“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，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”，“改良社会，文字不及戏曲之捷；提倡美术，工艺不及戏曲之便”。张謇在南通修建现代化的“更俗剧场”，聘请欧阳予倩主持中国最早的现代戏剧学校——南通伶工学社，专辟象征南北两派京剧艺术家团结合作的“梅欧阁”，无一不是为了培养人才，以新文化来移风易俗，改造社会。兴办这些事业，耗去张謇不少精力，费去不少钱财。

但是，光凭钱财和名望，而无造福乡里、奉献社会的赤诚之心，是很难吸引住人才的。因为，真正的艺术家，是金钱买不到的，也是难被名望所唬住的。

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京、昆艺术的完美追求，为张謇与梅兰芳之间铺架了一座知音之桥。状元公张謇，本身就是国学大师。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使他对京昆剧目中的人物性格，对演员的唱念做打，都有精到的见解。他对梅兰芳关爱备至，时有诗文赠送，但从不溢美吹捧，偶尔发现不当之处，总是及时、善意地提出修正意见，而且每每能提到点子上。在宿疾沉疴的旧社会，对演员、艺人惯用的手法，不是吹捧，便是棒打，鲁迅先生谓之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张謇与梅兰芳一反当时的污浊潮流，别开实业巨子、国学大师与艺术大师之间友情的新生面，其意义是深远的。